



关于战争描写与命运图景

——重读红色经典作品《苦菜花》 □许平

一、真实的人生经历与感悟

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成功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整的革命母亲“仁义嫂”这一经典英雄形象，也被普遍称之为中国版的高尔基《母亲》。自1958年首版至今63年来，《苦菜花》多次再版，发行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并改编成多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影响了几代人。

《苦菜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的残酷斗争为背景，描写了山东昆崙山区军民的抗日斗争。这部根据作者自己家族经历和家乡抗日背景创作的小说，既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激烈，讴歌军民抗日英勇献身的壮举，又书写了底层妇女经过战争历练成长，歌颂母爱和爱情，在同时期革命历史小说中颇具特色。

重读《苦菜花》，走进胶东半岛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求索，在困境中砥砺前行、不屈不挠的画卷，我们仍作为作品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和事迹所感动和折服。《苦菜花》的成功，得益于它的真实。冯德英笔下的母亲是许多革命母亲塑造的艺术形象。当然，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冯德英母亲曹文琳对他的影响，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塑造出这个母亲的经典形象。毕竟曹文琳的原型就是他的母亲，娟子原型是冯德英的大姐。

1935年12月，冯德英出生于山东乳山昆崙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昆崙山区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是日军疯狂扫荡和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日军肆意地破坏、草菅人命等毫无人性的侵略行为，激起了许多山区青壮年男性的愤慨，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村里留下老弱妇孺也配合着八路军在敌后顽强地抗击侵略者。

冯德英的父亲冯日荷是村里地下党指导员，大哥冯慕最早参军去东北抗日。冯德英的大姐冯德清思想进步，早早参加革命，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妇女干部。在这样的革命家庭中成长，冯德英9岁就当上了儿童团长。

母亲劳作辛苦异常，还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子女，但积极支持家人参加革命工作，她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勤劳能干，心眼好，热情好客，家里便成了有名的革命“招待所”。每当区县委干部，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自己在家门口做针线活儿进行掩护，并安排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会后，母亲总要留远道而来的干部们吃顿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们已经习惯于阅读和写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之际，已经创作出版了大量成功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黑掌柜》《社迷》系列的郭澄清，却突然在197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之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三卷集120万言的《大刀记》，熟悉的读者和朋友们甚感意外。

《大刀记》三卷是融集了人的成长史、家族史、民族史于一体的结构布局，叙述了中国广大农村从清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40年狂风暴雨的变迁，从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两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农民的觉醒史，如同一声惊雷，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

在《大刀记》出版后的半年时间内，发行量超过了300多万套。而创造奇迹的是连环画《大刀记》，有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了《大刀记》（辽宁1-5册，河北1-3册，山东上中下册）。近几年黑龙江省出版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又出版了新版本，总计发行量3000多万套。至于当年电影《大刀记》和话剧《大刀记》以及小说连播《大刀记》，受众更是数亿人之众。

一、《大刀记》的写作背景

长篇历史小说《大刀记》，从1955年完成初稿《马振华英烈传》开始，到1965年二稿《武装委员》，再到1972完稿的三稿《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最终到1975年四稿《大刀记》三卷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历了漫长地从1955年至1975年，20年的写作和修改的曲折过程，也可谓百炼成钢刀。

作者郭澄清是1948年在渤海军区渤海纵队服役的青年干部，参加了解放济南战役，济南解放后转为山东省教育厅干部。但在郭澄清的心里，思念着在冀鲁边区和渤海军区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正如郭澄清在1985年重病中写的长篇小说《笔》中所言：我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为此，郭澄清于1950年，坚决要求离开济南回到他战友牺牲的地方，他的家乡宁津县工作，被任命为宁津县直属完小（初中）校长，兼宁津县一中（高中）教导主任。于1953年开始收集大量资料，到1955年写出了10万字的传记文学《马振华英烈传》。

去年，中国言实出版社王昕朋社长，在我的家里发现了油印《马振华英烈传》稿，并将于今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相信今年的读者能大饱眼福。由于传记文学必须是真人真事，马振华烈士的牺牲悲剧，从而导致了《马振华英烈传》在当时未

1941年深秋，有一位伤病严重的女八路军住进冯德英家疗养。从住进家的第一天起，母亲待她比亲闺女还亲，专门腾出一间最好的正房给她住，还亲自为她烧炕煎药喂饭，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和舍不得吃的鸡蛋做面条饺子，变着花样调节饮食，为她增加营养。两个月后，这位八路军女战士伤病痊愈，重返部队。

而与此同时，冯德英年仅3岁的小妹却因缺乏营养，患病无钱医治，母亲无暇照顾，不幸夭折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家里住进的八路军增多，母亲就把三间南房腾出来给男战士住，北面正房给女战士、女干部住。有时来的人多了实在挤不下，大闺女就到邻居家借宿。母亲给战士们烧炕，缝补衣裳，战士们不好意思，她就生气地说：“你们这些孩子，这是对谁啊？在我这里不跟在你们家里一样吗？”

失去幼女的残酷打击，没有使母亲一蹶不振，更没有影响她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对战士们的厚爱。她的那种抑制悲痛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风范。

当时冯德英所在的村子，几乎每家每户都住着伤员，很多农村妇女像冯德英的母亲一样，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她们以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为革命胜利做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

1946年初，冯德英11岁的时候，积劳成疾的母亲不幸病逝。母亲虽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却忠实地履行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虽然不是拿枪牺牲在战场上，但人们公认她的所作所为算得上真正的革命者。

因此，母亲下葬的那天，许多干部和群众都自发前来为她抬棺扶柩，他们心情沉痛，隆重送别这位革命母亲。

受母亲的影响，冯德英的二姐和他本人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是这些深刻的红色记忆和对母亲的深切缅怀，促使冯德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得天独厚有幸生长在先烈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英雄人民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精神宝藏，使我的创作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

二、永不言弃的创作之路

1950年春，冯德英偶然看到柯蓝的小说《洋铁桶的故事》，被书中军民抗日的故事情节打动，勾起了他对故乡军民抗日斗争的深情回忆。这是他第

一次接触小说，也是第一次感到自己熟悉的生活能够写成一本书，产生了书写身边英雄的创作冲动。

于是，他爱上了文学，并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开始练习写作。每天都记录日记，还把自己经历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由于只上过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低，冯德英的创作内容反映不出想要表现的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便因失望而辍笔。但他的创作激情却难以遏制。不论睡眠时间或工作之暇，一想起那些动人的事和人，心里就非常激动，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流泪。

1953年他开始写怀念自己母亲的纪实文学，四万多字，也就是长篇小说《苦菜花》的雏形。但真正开始创作小说《苦菜花》是1955年。那时候远在海南的冯德英听到了家乡的一个悲剧，有个邻居的两个儿子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老人自杀身亡。冯德英反思，自己有幸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怀念歌颂自己的母亲，那些牺牲的战士，他们的母亲由谁来书写和纪念呢？还有谁铭记她们？有谁知道她们把儿子送上战场，为中国革命默默做出的奉献呢？于是，冯德英决定不再局限书写自己的母亲，他要歌颂所有革命者的母亲，歌颂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当时他在三亚执行任务，稿子是在电报上写的。1955年秋调到汉口工作，在中南空军教导连教授无线电课程，在紧张的军事工作之余，他见缝插针断续地写作。

他先把稿子写在电报纸上，再在稿纸上誊清。刚开始创作的时候计划写10万字左右，但第一遍稿件写了十七八万字，仍然还有很多生动的人和事遗漏了。冯老感到不安，于是继续创作，期间，他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将胶东地区抗日英雄于得水的事迹写入小说中，从而塑造了于德海团长的高大形象。第二遍稿写下来已是28万字了。

1955年，年仅20岁的冯德英终于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母亲》寄给了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不久后，冯德英收到来信，说稿子不错，他也被叫到北京修改小说稿。1956年冬天，冯德英前往北京修改小说，历时5个月，使小说字数增加了10万，总计达到38万字，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他进一步展开故事，细化情节。1957年5月，长篇小说《苦菜花》定稿。

因为他的小说与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同名，出版社编辑希望他改个书名，冯德英一下就想起了家乡的苦菜花，苦菜花的根虽然苦，开的花却是香的，它代表坚强的母亲和贫苦老百姓最合适。

但小说修改完后，因特殊时期，小说的出版推迟。1958年1月，《苦菜花》作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一本长篇小说与广大读者见面，200万本书很快被读者抢购一空。当时只有23岁的冯德英一夜成名，不仅荣立了一等功，还得到了8000元的丰厚稿酬，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可他一分钱没留，全部捐给了家乡的革命烈属。

1958年11月，冯德英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时，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周总理鼓励他说：你这么年轻，写一本还不够，还要继续写。

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山菊花》《迎春花》，《迎春花》主要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汪化堂潜入解放区后方，亲率匪徒偷袭暗杀区委书记和区长，曲妻曹春梅和和县委干部张滔接任后和特务不断斗争把他们送上战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革命处于相对低潮阶段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胶东昆崙山区人民反抗阶级压迫、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武装暴动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冯德英的“三花”长篇系列集中反映了胶东半岛人民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情节起伏跌宕，语言清新流畅，性格描写细腻生动，具有抒情乡土的特征。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发行，《苦菜花》有幸入选。1965年和2004年，小说《苦菜花》又分别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风靡全国，广受欢迎。

当然，冯德英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主要得益于他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和他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党的教育、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给冯德英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与体验，为他的创作储备了丰富而宝贵的生活素材。



三、《苦菜花》中的革命精神和不屈女性力量

《苦菜花》和同时期很多作品相比，可读性更强。重要原因在于描写革命斗争的复杂与艰险的同时，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感情多了细腻的描述，更人性化。正是因为书中多了很多女性角色，情节才更丰富。可以这样说，《苦菜花》主要围绕8个女性形象展开，是一部农村妇女的革命和个人觉醒史，也是女性群像图。莫言对《苦菜花》的评价就很高，他认为解放后的17年以来这部小说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冯德英擅长描写女性，这跟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从小跟母亲和姐姐长大，家里常年住着八路军女干部，所以他擅长描写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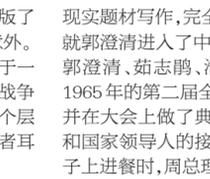
《苦菜花》中“母亲”的觉醒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母亲的成长代表了千百万革命母亲的成长。她的那种伟大母亲的慈爱心和革命意志，从一个只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从人性的变化，到革命精神的涌入，再到女性力量的展现，无一不体现着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

《苦菜花》是一部夹杂着无数细节和苦痛悲欢的全景纪录片，其中渗透了真诚炽烈的情感，夹杂着沉甸甸的反思，也有无数的憧憬与希冀，共同织就而成一幅色彩斑斓又令人意犹未尽的壮美画卷。也由此让《苦菜花》在今天仍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因为足够真诚与精心构筑，让作品的故事似乎依然跳动着蓬勃的时代脉搏，也获得了跨越时空的动人艺术魅力。

重读《苦菜花》，阅读那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事迹，领悟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历程，继承苦菜花精神，对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郭澄清与《大刀记》30年的情缘

□郭洪志 梁临平



能通过出版社审查，落在了50多年后的今天才得到出版机会。这也应该是《大刀记》最初的一部分初稿。

把时光拉回到1959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郭澄清到基层任宁津县时集公社副书记，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农民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集体的真诚，感动着郭澄清。他在196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社迷》的后记中写道：那时节，形势发展一日千里，新人新事层出不穷，祖国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愿把亲眼看见的新人新事写出来，希望曾经教育了自己的事迹，能再感染别人。作家的感言，无意中说出了为什么暂时停下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缘由。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郭澄清的

现实题材写作，完全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性和感人素材，反而成就郭澄清进入了中国文坛和中国当代文学史。1965年，李準、郭澄清、茹志鹃、浩然等几位作家，作为特约代表，参加了1965年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他们共同到表彰大会并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李準和郭澄清与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桌子上进餐时，周总理称其为作家。

郭澄清一直在农村基层实干工作，他可以在现实题材上进一步创作。但是，郭澄清的整个童年和马振华烈士一样，经历了血与火的民族苦难和个人苦难。民族苦难和民族觉醒的奋斗史，已经完全融入到郭澄清的血液之中。北京参加会后，郭澄清又立即投入到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武装委员》的写作之中，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张羽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为组到郭澄清的《武装委员》这部书稿，我和阎德隆总编到郭澄清家乡宁津县待了一个多月，手稿交到我们出版社后，很快就排版打出了清样，并设计好了封面，即可出版了，没有想到，突然运动来了，印刷厂停产，社领导停止了工作，瘫痪了，手稿和清样也不知道下落了。这实质上应该是《大刀记》第二稿。

转眼到了1969年，郭澄清被调到了样板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完善剧本工作，住在北京的二七副厂，这一住就是近一年，据同时在剧组的文学评论家任孚先回忆文章：在北京的数月期间，真如徐庶进曹营一般，郭澄清天天偷闲捧读外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帮助他早已酝酿之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构思。那时，稍有空闲，他便和我交谈长篇的内容，讲到动情之处，这位华北平原的硬汉子竟不禁泪流满面。在探讨小说的名称时，他起了数个，我从中认定《大刀记》较合适。他思索再三，尊重我的意见，定名为《大刀记》。事实如此，并非我掠人之美。

1971年郭澄清回到家乡宁津县翠柳村编写第三稿《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在北京《奇袭白虎团》剧组，大量捧读中外名著，为郭澄清的三稿《大刀记》提供了比前期更充分的酝酿准备工作。《大刀记》融入了郭澄清自己的童年和马振华烈士的家族史，更是借鉴了《静静的顿河》《风云初记》的笔调风格，下笔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到一年第一部《血染龙潭》完稿封笔。可惜的是，1972年的《血染龙潭》未能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查，这一压就是三年。

从1972年到1974年，郭澄清仍然不顾一切地开笔《大刀记》第二部《风火燎原》的写作，应该说明的是，这第三稿第二部《风火燎原》有1965年《武装委员》的影子，他在写作时常常翻阅残缺不全的《武装委员》手稿和《风云初记》《静静的顿河》。我们家人虽然时常看到这样的动作，但谁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今天我似乎才明白一点当时郭澄清写作《大刀记》时可能有所想和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整体的《大刀记》二部三卷于1974年10月全部完稿封笔。但一直等到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全国整顿展开后的1975年3月底，郭澄清被约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再进一步修改《大刀记》，看看是否有争取得出版的机会。《大刀记》创作的前前后后是漫长曲折并复杂的过程，尤其是最终定稿出版的《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未能获准出版，只保留了《血染龙潭》第一部前半部分，作为开篇收录在三卷本《大刀记》中，部分失去了艺术的整体和民族史诗的阅读感受，更是把《大刀记》第二部删除了一些章节，使故事律放慢。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翟文斌教授所言：我时常想，《大刀记》第二部如果按照第一部的节奏写成三卷，会非常好，那也许是另一部《风云初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潭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作家郭澄清写在《大刀记》首页上的话，道出了我们的父亲郭澄清几十年都不放弃创作《大刀记》的情感动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既有作者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也有与郭澄清并肩作战的战友和领导，包括马振华烈士和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

二、《大刀记》手稿留下了迷雾似的疑问

在李宗刚教授编著的《郭澄清研究资料》一书中，他特意收录了郭澄清手稿影印版资料，为将来有心研究《大刀记》的学者打开一扇门。影印的《大刀记》手稿第一章近3万又分为5个章节。第一章：梁永生捉鸡闻祸。一：赤足少年；二：是永生的家；三：永生的爹娘；四：苦难的童年；五：贾家大院。这一章没有收录进入正式出版的《大刀记》任何版本，但是可读性强，苦难的叙述感人至深，我们家人读了，个个禁不住都泪流满面。而正式出版的《大刀记》第一章手稿影印版，也收录在《郭澄清研究资料》一书中，这个正式出版的第一章应该是第二章。大家拿来《郭澄清研究资料》一读，定可耳目一新。

《大刀记》正式出版发行后，作者郭澄清反而更加视手稿胜过自己的生命。在1975年8月《大刀记》出版刚刚半年的时候，1976年5月6日，郭澄清在强大的无形压力与悲伤之下，突然倒下昏迷不醒，半个月后，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醒来的郭澄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大刀记》手稿。重病后的1976年到1989年8月10日去世的13年中，不论在医院还是在哪儿，《大刀记》手稿从来始终不离郭澄清的身边，手稿连着郭澄清的心，似乎他的灵魂就在《大刀记》手稿里。父亲去世的当天上午，仍然坚强地爬起来（偏瘫13年，天天如此坚强），用嘴巴咬着拔出钢笔帽，写他的《纪晓岚》（已写了近150万字），临近中午，突然感觉呼吸困难无力，他强忍着难受，让我们拿来几斤重的《大刀记》手稿，对我们说，将来想办法争取机会出版这个手稿的《大刀记》手稿，然后就停止了呼吸，离开了我们，更是带着对文学的留恋和对《大刀记》出版的遗憾离开了他视如生命的文学事业。

在2005年，当我们整理《大刀记》手稿，并动员了多位我的研究生，轮流工作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打印并扫描拷下手稿《大刀记》影印软件，这些硕士生和博士生都以为《大刀记》手稿写得好，为什么改来改去再出版。

郭澄清记忆力超强，据原《诗刊》副主编杨金亭回忆文章：在我所认识的诗人和作家中，我的老朋友郭澄清记忆力最好，他过目不忘，《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均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从手稿《大刀记》一眼看去，那钢笔字体形如字帖，文笔更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是属于那种慧根才气又努力的作家。可惜，生不逢时。应该说，郭澄清的短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展现和还原了郭澄清的文学才华。

三、风趣幽默受欢迎的郭澄清

只要郭澄清一回到家乡郭皋村，就如同春风立即吹到家家户户，我们家屋里院里经常是人挤人，邻里乡亲都来到我家听郭澄清说话。

父亲的学生、原山东省文化厅厅长张长森常说：郭老师讲国际形势，讲外交战略能让所有人激动起来，在赶集的集市上，只要有人认出他，立即喇叭一样叫喊起来：郭澄清！郭澄清！给我们讲讲，这时，行进中的人都停下脚步，围过来竖起耳朵听讲话，人们都说，政策讲得明，道理说得清，过瘾！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吴开晋以及河南南作协副主席王绥青等回忆文章中记述：老郭口才极好，人很幽默，又忠诚可亲，大家都喜欢找他聊天。

吴开晋教授在回忆文章说：为了他改稿方便，叫他单独住在一个红砖小楼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到10平方米的一间斗室里，想不到那儿成了各省市来人文社作家聊天、交流信息的小“沙龙”，每天作家们聊天到深夜。郭澄清短篇小说的幽默语言和戏剧叙述风格，绝对是郭澄清式风格，这就是作家的本性使然。

作家李子回忆文章写道：1964年3月，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大型文学戏剧创作会议，在讨论时，40多人，开始谁也不发言。主持人说，叫咱们的大旗老郭谈谈吧！坐在角落的郭澄清谦虚地让大家说，但大家马上以热烈掌声叫老郭讲。老郭一开讲，本人就是一台戏，他不光文章写得好，幽默又风趣，讲话很有功夫。他说，写农民锄地，怎样往前扔锄，怎样往后拽锄，前腿要躬，后腿要蹦，两膀用力，胳膊使劲，把锄扔过去再拽回来，他手舞足蹈，连说带比划，形象极了。他说得嘴角白沫，也不歇劲，既形象又生动，大家听得非常上瘾。他想不讲了，大家不干，这上午又没人发言，他全包了。北京来的领导陈荒煤、金镜一声不响地听。这就是郭澄清，他能写出《黑掌柜》《社迷》《公社书记》是必然的。

当年我从和平里屠岸先生家里出来，老人家一直送我并再三嘱咐我说：您知道我家的电话，有麻烦的话，随时打电话来。就这样我驱车来到安定门外东河沿谢永旺先生家里，谢叔叔作为《大刀记》的责任编辑，对《大刀记》了如指掌，在《大刀记》手稿中，每一页都有他留下的手印和笔墨，看了屠岸先生的他激动万分，竟然拿出他最好的酒让我带给刘玉山社长表达谢意。我从心里非常理解谢永旺叔叔，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编辑出版了《闪闪的红星》和《大刀记》这两部作品，当年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在郭澄清的家乡郭皋村和宁津县委招待所之间跑来跑去，吃着母亲给他做的粗食和没有油水的菜汤，编辑着他的文学梦《大刀记》。

《大刀记》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典藏”“建党100年影印版丛书”“百年百部红旗谱”等系列书目之中。学者孟繁华认为，这证明《大刀记》已经被经典化了，这个经典化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经验。